

形式上常常呈一种流散铺排的方式。汉民族潜意识地认为:只要语句在意义上有关联,逻辑上就可以构成前言后语,就可连句成章,而不必追求形式上的紧密连接(王寅等,1996:67)。名词谓语句通常由双名词组成,它们通过成分结构的概念关系形成,而成分结构的整合通过它们侧面之间的对应关系来实现。我们认为,名词成分概念关系的呼应性和概念化者语义推理的顺应性是驱动名词谓语句意义建构的主要动因,它们共同促成了名词谓语句“[(NP₁)NP₂]”结构中NP₁与NP₂在表达层面上的连接。如前所述,名词谓语句最基本的语义是对主语NP₁进行说明和描写,这种说明和描写以概念化者对NP₁和NP₂的关系判断为基础,是概念化者主观意识的产物。例如:

(11)今天星期三。

例(11)由主语名词“今天”和谓语名词“星期三”组成,概念化者使用“今天”这个词时,同时激活了诸多合适的框架使“今天”与其他语言成分发生联系,如:“今天星期几”“今天干什么”“今天天气怎么样”“今天去哪里”等。一旦入句,“今天”就具备了这种关系潜势,需要与其他概念内容建立连系,可以从众多意义分布中进行恰当选择。在星期三激活的【星期】框架中,概念化者根据“今天星期几”和“星期三是哪一天”的呼应关系顺势进行语义推理,做出“今天”和“星期三”概念关系同一的判断,即“今天是星期三(今天=星期三)”,至此完成对“今天”凸显概念内容的进一步说明。

由是观之,必须从概念关系和概念化者两个方面来探讨名词谓语句的认知动因。从概念关系的角度来看,名词谓语句语义联结的实现主要是主语名词与谓语名词指称对象的概念内容具有呼应的概念关系,因为入句后的名词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关系潜势,需要与其他概念内容建立连系。从概念化者的角度来看,呼应的概念关系有利于概念化者做出顺应的语义推理,主、谓名词在意义上的关联最终促成了它们形式上的连接。

概念关系的呼应性和语义推理的顺应性是互相关联的,但也有区分,是从不同角度做出的论述:概念关系的呼应性主要是基于两个概念成分之间的呼应关系;语义推理的顺应性是从概念化者主观化的角度讲的,与逻辑学中的推理有不同之处,它不依靠严格的逻辑推理形式,概念主体从语义关联角度做出合理推理,建立语言成分的对立关系,从而获得表达层面的连接。顺应的语义推理离不开相呼应的概念关系,因此,概念关系的呼应性又是概念化者进行语义推理的基础和前提。

4 结语

体认语言学强调心智和语言的体验性,主张语言是在人们对现实世界进行“体”(互动体验)和“认”(认知加工)基础上形成的。是以,对于任何一个构式意义或其形成动因的考察,都必须回到体验的源头,才能真正把握其认知机制。本文运用体认语言学的分析方法,利用理论间互相修补和完善的机制,建立FRG模型对名词谓语句做进一步考察。该模型反映了人类基本的体认过程,能够对语言构式做出合理解释。本文以此为依据,围绕汉语名词谓语句中并置名词的概念参照关系,对该构式的界定、分类及构式义进行阐释,揭示名词谓语句产生的认知动因。研究表明,名词谓语句在认知语法视角下的界定是[(NP₁)NP₂],其构式义是:任何概念化者从NP₁到NP₂进行顺序扫描,能够建立两概念间或包含、或同一、或联想的基本关系,从而实现NP₂对NP₁性质或状态的描写。以基本概念关系为依据,进而将名词谓语句划分为三个基本类别:包含式名词谓语句、同一式名词谓语句和联想式名词谓语句。汉语名词谓语句从名词成分的概念关系呼应出发,通过概念化者的语义推理进行意义选择,最终形成表达层面的名词连接,是一系列动态认知操作的结果。在整个概念化过程中,概念化者从两个名词成分的概念关系出发,根据语义推理的顺应性做出表达层面的连接操作。换言之,概念关系的呼应性和语义推理的顺应性是名词谓语句形成的源动力。

参考文献:

Fillmore, C. J. 1975. An Alternative to Checklist Theories of Meaning[G]// C. Cogen et al.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31-123.

- Fillmore, C. J. 1985. Frame Semantics[G] // Linguistic Society of Korea. *Linguistics in the Morning Calm*. Seoul: Hanshin:111-137.
- Fillmore, C. J. 1985. Frames and the Semantics of Understanding[J]. *Quadernidi Semantica*(2):53-222.
- Lakoff, G.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zation Reveal About the Mind*[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ngacker, R. W. 1993. Reference-Point Construction[J]. *Cognitive Linguistics* (4):1-38.
- Langacker, R. W. 2016. Baseline and Elaboration[J]. *Cognitive Linguistics* (3):405-439.
- Langacker, R. W. 2017. Evidentiality in Cognitive Grammar[G] // Marín I. J. et al. *Evidentiality Revisited: Cognitive Grammar, Functional and Discourse-Pragmatic Perspectives*.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陈建民. 1986. 现代汉语句型论[M]. 北京:语文出版社.
- 陈一, 赵惜微. 1998. 谓词性成分作主语的体词谓语句[J]. 北方论丛(1):101-105.
- 高航. 2009. 认知语法与汉语转类问题[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刘月华, 潘文斌, 故 犇. 1983.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吕叔湘. 1942. 中国文法要略[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马庆株. 1991. 顺序义对体词语法功能的影响[J]. 中国语言学报(4):101-104.
- 庞加光. 2017. 汉语认知句法研究[M]. 北京:科学出版社.
- 施春宏. 2001. 名词的描述语义特征与副名组合的可能性[J]. 中国语文(3):212-224.
- 王红旗. 2016. 体词谓语句的范围和语法形式[J]. 汉语学习(2):3-10.
- 王珏. 2001. 现代汉语名词研究[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王寅. 2013. 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为语言哲学之延续——二十九论语言的体认性[J]. 中国外语(1):18-25.
- 王寅. 2014. 后现代哲学视野下的体认语言学[J]. 外国语文(6):61-67.
- 王寅. 2015. 20 世纪的三场语言学革命——体认语言学之学术前沿[J]. 外国语文研究(2):2-11.
- 王寅. 2019. 像似性十辨——体认语言学的像似观新解[J]. 当代外语研究(1):57-66.
- 王寅, 李 弘. 1996. 英汉语言区别特征研究[M]. 北京:新华出版社.
- 项开喜. 2001. 体词谓语句的功能透视[J]. 汉语学习(1):13-17.
- 叶长荫. 1987. 体词谓语句[G] // 汉语论文集.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周日安. 1994. 体词谓语句的分类[J].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49-55.
- 周日安. 1994. 体词谓语句的范围[J]. 河池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50-55.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M]. 北京:商务印书馆.

The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Perspective on the Nominal Predicate Sentences: Constructional Definition and Cognitive Motivation

TIE Yi QIN Xuqui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cognition is based on embodiment and language is the result of interactive experience as well as cognitive process. This research first establish the FRG model under the guidance of ECL, and then explores the $((NP_1)NP_2)$ construction and its cognitive motiv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three different kinds of conceptual connections in the $((NP_1)NP_2)$ construction, and the conceptualizer realizes its epistemic control on the clause reference according to the conceptual connections in the sequential scanning from NP_1 to NP_2 , so as to achieve the instantiation of the clause. As an independent structure, the $((NP_1)NP_2)$ construction has its own cognitive motivation. The coordination of conceptual relations and the adaption of semantic reasoning are the two driving force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NP_1)NP_2)$ construction.

Key words: ECL; nominal predicate sentences; $((NP_1)NP_2)$ construction; cognitive motivation

责任编辑:朱晓云

体认语言学的后现代哲学渊源再探

彭志斌

(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重庆 402167)

摘 要:体认语言学是在修补国外认知语言学忽视“唯物论”和“人本观”之不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本土化语言学理论,使语言学研究汇入后现代人文大潮,是当今全球人文学科之前沿。分析发现,ECL 虽在 CL 基础之上发展而来,但多数主张还是受到了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影响,诸如“反传统”“差异性”“模糊性”“非哲学”“反基础主义”“去中心化”“多元化方法论”“多视角主义”“后人道主义”“非理性主义”等后现代哲学特征都在 ECL 中有所体现。在后现代哲学风靡全球的时代,ECL 这种语言研究范式的出现是时代之使然。

关键词:体认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后现代哲学;哲学渊源;体验哲学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19)05-0030-08

0 引言

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 CL)自 20 世纪 70 年代诞生以来,历经四十余载,硕果累累,追随者众多,业已成为当今国际语言学领域的主要范式之一。虽成果丰硕,但问题亦存。经过反思,我们发现:其一,名实不符,CL 是以强调“互动体验”的体验哲学(Embodied Philosophy, EP)为直接哲学基础的语言研究范式,其名称却只体现了“认”,而忽略了“体”。其二,“任何语言学理论或理论模型都不可能凭空产生,而是学科内部发展以及所处时代外部思维方式的结果”(Enrique,1999:12),认知语言学也不例外。目前的认知语言学研究仅囿于体验哲学的哲学背景,却未走进更为广阔的哲学领域。针对以上两个问题,我们赞同王寅教授的修补方案:第一,将“认知语言学”这一名称修改为“体认语言学(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简称 ECL)”,弥补其仅体现“认”而忽略“体”之不足,以使其名实相符(王寅,2014/2018;王寅等,2019)。第二,ECL“体现的正是当代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Enrique,1999:13),ECL 学者不能仅仅躲在“体验哲学”的怀抱中,应该躺到后现代哲学的摇篮里去汲取养分(王寅,2012b/2013/2015)。以上两个问题并非互不相关,而是共同关涉 ECL 的哲学基础:体验哲学是 ECL 的直接哲学基础,后现代哲学是 ECL 和体验哲学产生的哲学渊源。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围绕上述两个问题继续探讨 ECL 的后现代哲学渊源。文章首先讨论 ECL 与体验哲学和后现代哲学之间的关系,然后探讨体验哲学对后现代哲学的继承与发展(解决问题一),最后阐述后现代哲学特征和思潮在 ECL 中的具体体现(解决问题二)。

1 CL 和 ECL 与体验哲学和后现代哲学的关系辨析

众所周知,CL 的哲学基础是体验哲学(Embodied Philosophy)(Lakoff et al.,1980/1999;王寅,2002)。体验哲学的思想是“认知语言学”创始人之一 Lakoff 教授与哲学家 Johnson 教授在其 1980 年出版的轰动世界学术界的经典著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首次提出,最初称其为“新经验主义”(experientialism)。该书不仅是要谈论隐喻遍及我们的概念系统,是我们思维的最基本方式之一,两位作者有更远大的抱负:彻底改变传统认识论,改变 2000 多年来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占统治地位的“客观主义神话”(myth of objectivism),批判的矛头直指西方思想的核心主张:绝对真理。在 1999 出版的《体验哲学》一书中,两位作者更系统地实施了整个计划。他们把

收稿日期:2019-05-30
作者简介:彭志斌,男,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语言哲学研究。

西方哲学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经验论和唯理论统称为客观主义哲学,进而提出了第三种选择:体验现实主义(embodied realism),即体验哲学,以作为 CL 的哲学基础。客观主义哲学将主、客体割裂开来,认为客观世界背后存在一个绝对真理,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追求这一绝对真理。而体验哲学认为心智具有体验性、认知具有无意识性、思维具有隐喻性;没有独立于人所理解的绝对的客观真理。

“从广义上来说,哲学是语言学的摇篮”(Robins,1967:103),任何语言学理论的出现都是时代思维的产物。CL 内部所提出的体验哲学并不可能成为 CL 和 ECL 的哲学渊源。CL 诞生于 1975 年(王馥芳,2014:24),而体验哲学是 1980 年首次提出并于 1999 年趋于成熟的哲学理论,因此从产生时间上来看体验哲学也并非 CL 产生的哲学渊源,这二者是共同生长,相互促进的。那么,导致 CL 这种语言研究范式产生的哲学渊源究竟是什么?

回顾一下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世界哲学舞台的场景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启示,20 世纪 70、80 年代正是后现代哲学在世界哲学舞台唱主角的时候。我们认为,ECL 是后现代哲学思潮影响下的产物。

“后现代主义”这一术语最初用于 20 世纪 40、50 年代的建筑学、诗歌等领域,表示有不同于传统的风格,个性化的风格;到了 60 年代,表现为一种文学文化现象;70 年代之后,才被赋予了一种哲学的概念(王治河,2006:3-5)。因此,后现代主义真正登上哲学舞台是在 70 年代,先于 80 年代才出现的体验哲学,这与 CL 的诞生时间基本一致。因此我们可以说,CL 的产生是受到了后现代哲学的影响。从哲学对语言学的牵引这一点来看,我们也可以说 CL 这种研究范式的出现是一个历史的必然,因为彼时“后现代的幽灵”在世界范围内大行其道。CL 并非是某一个人或学术团体引领的研究流派,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而是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语言学学者基于同一理论假设指导下的具有不同理论主张和研究方法的事业(Evans,2012:129)。我们认为,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语言学者不约而同地持有了相同的理论假设,正是因为他们都受到了当时正盛行的后现代主义的影响。

可见,体验哲学与 CL 大致产生于同一时代,二者同生共长、相辅相成,均与后现代哲学密切相关。但二者有何联系与区别?

2 体验哲学是对后现代哲学的继承与发展

Lakoff 和 Johnson 曾在他们的著作(1980,1999)中几次提到体验哲学有别于后现代哲学。Lakoff & Johnson(2003:273-274)曾表示“体验哲学与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某些重要原则存在分歧,尤其与‘意义没有基础,仅仅是抽象的文化建构这样的主张不符’;对后现代主义者而言,“所有意义都是任意的、相对的、偶然的,不受身体与大脑的约束”(Lakoff et al.,1999:5)。我们认为其主要分歧当指体验哲学强调身体与世界的体验,反对后现代主义过分解构、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思想。尽管如此,我们认为体验哲学也是在后现代哲学的影响下产生的,且对后现代哲学有所发展。其理由如下:

首先,一些后现代哲学家对体验哲学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Merleau-Ponty 和 Dewey 哲学中的互动体验思想对 Lakoff & Johnson(1980)产生了重要影响(王馥芳,2014:152/2013a),而 Merleau-Ponty 正是后现代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知觉现象学的创始人,其知觉世界不是纯粹的外界环境,而是人的因素(包括生理的和文化的)和外物的因素相互能动作用的结果。故知觉世界不是被人纯粹创造,也不是被外界纯粹给予,而是一种人与外物的对话。在这里,人与世界彼此开放,全方位交流,交流的内容被记入知觉世界中。这种主、客体互动交流思想对体验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其次,后现代哲学和体验哲学都挑战西方两千多年来的形而上学传统。Lakoff & Johnson(1980/1999)所倡导的体验哲学延续了后现代人本性这一研究取向,认为之前所有的哲学理论都具有客观主义倾向,他们挑战了西方形而上学理论,针锋相对地提出了非客观主义的体验哲学。王寅(2015:59)指出:“Lakoff 和 Johnson 创建的体验哲学(Lakoff et al. 1980/1999)正是顺应后现代哲学思潮的产物,尽管他们可能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但仅从他们挑战整个西方哲学传统,颠覆经典形而上学这一事实来看,将他们归入后现代哲学之中,当之无愧。”

第三,Lakoff & Johnson(1980/1999)对后现代哲学的反对主要是针对后现代哲学被广为诟病的虚无主

义、相对主义、专事摧毁无事建设等问题。“相当多的人对后现代主义的印象依然是负面的”,造成这一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介绍者、研究者对于后现代主义的‘窄化’,也就是将后现代主义完全等同于后现代主义的某一种形式——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王治河,2006:增补版序言)。我们认为 Lakoff 和 Johnson 由于只看到了后现代哲学的“解构性、破坏性”而对其进行拒斥。其实,针对后现代哲学的这些问题,一批后现代哲学家早已开始进行后现代哲学的建设性探索。出于对新实用主义和欧陆后现代主义激进性的不满,在对怀特海的过程哲学进行改造的基础上,形成了以格里芬和科布等人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哲学。如果说激进的后现代哲学侧重于对西方上千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进行摧毁的话,建设性后现代哲学则侧重于在激进后现代哲学所开辟的空间中从事建设性的耕耘(王治河,2006:289-328)。王寅(2012a)提出哲学的第四转向“后现代转向”,并将后现代哲学思潮划分为三个重要时期:第一期以“人本性、批判性”为主要特征,第二期以“破坏性、解构性”为主要特征,第三期则以“建设性、体验性”为主要特征,体验哲学和 ECL 当属后现代哲学第三期,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王寅教授把后现代哲学思潮分为三期,区分了解构性后现代和建设性后现代,避免了体验哲学与后现代哲学的冲突,并将“体验”元素融入后现代哲学并提出“体验人本观”,巧妙地将体验哲学纳入后现代哲学体系。因此,我们认为体验哲学的“体验”与我国一贯坚守的“唯物观”相吻合,该元素丰富了后现代哲学的内涵,体现了主客主多重互动理解模型(SOS),是对后现代哲学的发展。正是基于“认知语言学”对“互动体验”的重视,王寅教授首倡将其修补为“体认语言学”,以彰显“体验”(唯物论)在语言形成中的重要作用。这样就解决了首段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3 后现代哲学对 CL 和 ECL 的影响再探索

国内外已有学者探讨了后现代哲学对 CL 的影响。Enrique(1999:23)指出,稍作反思,我们就会发现 CL 的基本观点和当今后现代思维之间的“相似性非常明显”。但遗憾的是,文章并未对两者的相同点进行更多论述。我们对国外文献进行了大量的搜索,目前并未找到论述后现代哲学对 CL 的影响的文章。西方 CL 学者对后现代哲学的漠视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我国学者王寅教授早在 2009 年就敏锐地发现了后现代哲学对 ECL 的影响,在此后的十年间陆续发表了 20 余篇论文,重点论述了后现代哲学视野下的语言学研究,并带领四川外国语大学团队建立了“体认语言学”,这是对国外语言学理论本土化的有益尝试,值得国人密切关注。

王寅教授(2013/2015)论述了后现代哲学“去中心论”“多元论”“模糊性”“差异性”“原型范畴论”等对 CL 和 ECL 的影响,并将后现代哲学中的“激进人本观”和“悲观人本观”修补为“体验人本观”(王寅 2012b),基于体验哲学和后现代哲学提出了“主客主多重互动理解模型(SOS)”(王寅,2009),并论述了它们对语言研究的影响。他(2018)还探讨了后现代哲学所倡导的“特殊性”“非中心论”“多元论”在构式语法中的体现。刘玉梅教授(2013)在简述后现代哲学“体验人本观”和“多元多面”方法论的基础上探讨了构式语法的后现代特征。构式语法从消解中心主义、拒斥天赋观和生成观、批驳普遍概括假说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浓厚后现代特征的基本观点,如体验心智观和概括创新观、表层概括假说、语言用法观等。赵永峰教授(2015)认为,后现代哲学思潮从“去中心化”“主体间性”和“多元化方法论”三个方面为认知社会语言学提供营养。席留生教授(2015)分析了后现代哲学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多元性”和“体验人本观”等在认知语法研究中的体现和建构作用。

关于后现代哲学对 ECL 的影响,上述学者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对我们深刻理解 ECL 理论大有裨益。归纳起来,已有研究主要探讨了后现代哲学“非中心论”“(体验)人本观”“多元主义方法论”“差异性”和“原型范畴观”这几个特征和思潮在 ECL 及其分支中的影响。我们认为,后现代哲学还有其他特征和思潮,还有继续探讨的空间,下文将在已有成果上更进一步,以作补充。

后现代哲学滥觞于现代性的局限处,其总体特征主要有三:第一,深刻地“反传统”,后现代哲学多层次全方位地对传统哲学思维进行了发难。第二,注重差异性、特殊性,关注他者、弱小、边缘、局部、次要、偶然等等。第三,反对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方式,提倡模糊性和原型范畴观。其主要哲学思潮包括“非哲学”“反基础主义”“去中心化”“反一元论”“多视角主义”“非理性主义”“后人道主义”等(王治河,2006:前言)。下文

将对已有研究未论述到的总体特征和几大哲学思潮(“反传统”“非哲学”“反基础主义”“多视角主义”“非理性主义”“后人道主义”)对 ECL 的影响进行探讨以作补充,以证明很多后现代哲学思潮都在 ECL 中有所体现。以此说明本文提出的第二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总而言之,ECL 学者应当躺到后现代哲学的摇篮里去汲取养分。

3.1 反传统

后现代哲学所讲的“后现代”主要不是指“时代化”意义上的一个历史时期,而是指一种思维方式,“大胆的创新,彻底的反传统、反权威精神,则是这种思维方式的灵魂”(王治河,2014: 7)。后现代主义没有特定的发源地,它生长于现代主义的“局限处”。坚持对现代性及传统思维的否定,是所有后现代哲学思潮所具有的共同特征。

在后现代哲学这种“反传统”的总体思维影响下,CL 和 ECL 本质上是反对语言学固有传统,尤其是反对客观主义语言学、生成语言学和形式语义学(王馥芳,2013b)。它像后现代哲学一样,发难于语言学固有传统的“局限处”。生成语言学以句法研究为中心,完全拒斥意义研究,认为语言是一个“自治”的系统,意义对形式的作用微乎其微。对语义的排斥正是生成语言学的“局限处”,CL 和 ECL 学者以此发难,生成语义学应运而生,认为意义和形式密不可分,意义触发语言结构,意义影响语言形式。

我们还注意到,传统的语义研究几乎都是“平面化”的,在“意义对应论”或“意义替代论”视角下对其进行静态研究(王馥芳,2013b,2015)。CL 和 ECL 对这种“平面化”研究的局限性进行发难,继承了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1953)“意义即使用”的思想,争锋相对地提出了“基于用法的模型”。在 CL 和 ECL 看来,意义并非静态化的某种对等之物或某种内在的替代之物,而是与人的认知加工和语境密切相关,意义具有动态性、流变性、非确定性。生成语言学在客观主义哲学的影响下,以追求语言“核心句法”为旨趣,而将语言中除“规律性”之外的“特殊现象”排斥在外。为了给语言中这些“异常表达”正名,CL 和 ECL 以“特殊现象”为研究对象,以边缘反溯核心,逐渐形成了构式语法的研究新路径。

3.2 非哲学

后现代哲学反对以划一思维和二元对立思维为特征的现代性思维,对传统哲学“自立为王”的哲学观持有否定态度。它发难传统哲学,试图摧毁“哲学王”,颠覆传统的哲学观。因此,后现代哲学家也无意让自己的理论成为理论之王。尽管 Lakoff、Johnson (1999) 和 Lakoff (2007) 坚决认为客观主义和生成语言学都是错误的,只有 CL 才是唯一正确的语言理论(王馥芳,2014:63-64),但这种试图“自立为王”的极端观点受到了一些 ECL 学者的反对,王寅教授认为 ECL 虽反对固有语言学传统,但始终认为 ECL 也不能包打天下,并不完全否定生成语言学和客观主义语言学的研究范式。语言中既有客观成分,也有非客观成分。

我们注意到,Jackendoff 曾提出“三部分平行架构理论”,这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把生成语法翻了个底朝天”(2010: xxxvi, 王馥芳,2014: 69),但也保留了其所认为的生成语法的精髓。Jackendoff (2010: xxxvi, 王馥芳,2014:69) 认为,“构式语法本质上是生成语法的非转换研究”。Jackendoff (2010: xxxvii, 王馥芳,2014: 70) 还指出:“我们所呼吁的是用一种开放性思维对待无论来自何方的见解,一种在明显相互竞争的见解中看到冲突的意愿,一种为了更深入理解而公平竞争的共识。对我而言,那就是科学游戏的真谛所在。”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度正是后现代哲学摧毁“权威”以建立平等关系的旨趣所在。王馥芳教授(2014:67-80)基于霍金和蒙洛迪诺(2011:5-6)在《大设计》中提出的 M 理论,考察了不同语言学研究范式之间的理论关系。王馥芳(2014: 63)指出:CL 并非是唯一正确的语言研究范式,也并非语言学领域的“终极理论”或者“终极候选理论”,它同客观主义语义学、生成语言学三者的理论关系可以定性为“语言学理论一族”。我们也持相同观点,认为 ECL、客观主义和生成语言学在各自的范围内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语言学理论一族”是一种更为包容和更具建设性的新型理论关系,体现的正是后现代哲学“非哲学”罢黜“哲学王”的思想。ECL 学者对自身理论地位的态度正体现其拒绝把自身“自立为王”的后现代哲学思想,这与王寅教授近年来所倡导的“象豹论”完全吻合,我们只能摸到语言这只大象的某一部分,看到语言之豹的某一或某些点,而不可能是全部。

3.3 反基础主义

反基础主义是后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笛卡儿为代表的传统基础主义和 20 世纪分析哲学

为代表的现代基础主义都主张存在着某种永恒不变的知识基础,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去发现这样一个阿基米德点。正是这一为知识大厦寻求绝对不可动摇之基础的信念首先遭到了反基础主义的攻击,反基础主义者志在将人们从对基础的沉迷中解放出来,它只能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反基础主义者进一步摧毁了绝对的阿基米德点式的基本概念(理性概念、真理概念、实在概念等)以及基础主义的“等级”观念。

后现代哲学家试图摧毁基础主义所信奉的某种永恒不变的基础,这在语言学研究中则体现为对“深层结构”的拒斥。生成语言学在基础主义的影响下一直致力于寻找句法原基(syntactic primitive),试图找到语法的“阿基米德点”。CL和ECL在反基础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反对生成语言学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的区分,提出了“表层概括假说”,认为特定表层形式所蕴含的概括性信息要比所假设的深层结构中的信息更为丰富,即语言中概括性知识来自生活中实际用法,从中即可归纳出规律性信息(Goldberg, 2006: 33)。语法结构几乎是完全透明的,表层语法之下并不存在任何隐藏的深层结构,构式才是唯一的原素性语法单位(Langacker, 1987: 46; Taylor, 1989: 239)。“表层概括假说”从根本上反对生成语法的转换观和生成观,倡导语言“单层观”和“用法观”。

表层概括假说与后现代反基础主义思想一脉相承。后现代哲学家认为,基础主义所谓的“深层本质”只不过是“海市蜃楼”,“真正的本质就存在于现象中,真正的深层就寓于表层中”(王治河, 2006: 26)。生成语法排除意义研究,仅对句法形式进行纯形式概括。与此相对,我们认为语法知识的基本单位是形、义配对体的构式,概括是基于具体表达的抽象过程,是对形式与意义(或功能)两方面同时进行概括。认知心理学、语言习得实证研究和认知科学等经验证据表明,语言使用者的语法知识并非处于人类心智深处的“普遍语法”,而是基于使用而抽象概括出的构式,这才是语言知识在人类心智中的基本表征形式(刘玉梅, 2013)。

3.4 视角主义

视角主义是对一种固定不变观点的放弃,主张视角的多元性、多面化。视角主义操作的第一步是摧毁客观性思维。将客体还原为“视角的客体”,将存在还原成“为我的存在”。视角主义继承了胡塞尔现象学的观点,认为任何事物一旦进入人的思维中,就不得不被“本质化”。因此,纯之又纯的存在是不存在的。梅洛-庞蒂认为视角是对象本身的一种属性,“存在”对于我所具有的唯一意义是“为我存在”。视角主义操作的第二步是将“绝对的主体”多重化,认为康德以来形形色色的“主体性哲学”为了拯救世界的统一性和价值的普遍性而建构的“一般主体”是不存在的,是主观臆造的东西。在前两步的基础上,视角主义操作的第三步是强调视角的多面化、意义的多重性和解释的多元性。

ECL反对结构主义语言学“语言系统先验观”,拒斥语言先验“客体”的存在,而代之以人化的“语言”,认为语言是人的“认知”能力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ECL与生成语言学达成一致。但生成语言学虽然否认了先验“客体”的存在,却又陷入了另一个极端——“绝对的主体”,认为语言能力是人类先天具有,且有别于人的其他普通认知能力的专门的语言能力。ECL在主体性地位上与生成语言学决绝,拒绝承认生成语言学所主张的“语言能力天赋观”,否定了“绝对主体”的存在。ECL在摧毁“先验客体”和“绝对主体”的基础上,提出了“现实—认知—语言”核心原则,主张语言是认知主体与现实世界进行互动体验而进行认知加工后的产物。Langacker (1987, 1991)在认知语法中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为“识解(construe, construal)”,它就很好地体现了视角的多元化思想。为何我们会对同一个场景产生不一样的语言表达?原因就在于不同的人对同一事件会有不同理解,即使同一个人也会因时而异对同一事件产生不同理解,因此就产生了相同事件的不同语言表述。

3.5 非理性主义

非理性主义是由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以及其他一些思想家参与的哲学思潮。在非理性主义者看来,理性自立为王,以绝对真理的化身自居,理性的这种地位是不合法的。早期非理性主义者从认识论角度,认为传统哲学的错误在于把理性抬到无所不能、绝对的高度,排斥、抹杀、扭曲了非理性的东西。在颠覆理性的这种权威后,非理性主义者把各式各样的非理性东西推到了前台,是生存意志(叔本华)、权力意志(尼采)、思(海德格尔)、欲望与本文(德里达)、异(列维那)、历史(福柯)、机器(德利兹)等。战后非理性主义者从政治上揭露了理性的极权性和压迫性。非理性主义对西方理性的另一个弹着点是理性方法,认为作为方

法的理性在本质上是有限的,理性主义思想家的错误在于把这样一种有限的、极成问题的认识方法夸大成唯一的、无限的认识方法。在挑战了理性方法的局限性后,一些非理性主义者赋予情感以方法论的意义(如克尔凯郭尔),一些非理性主义者用直觉和体悟对抗传统的理性方法。

Cl 和 ECL 汲取了非理性主义的思想,以语义研究为中心,在语言研究中充分考虑了人的非理性因素。生成语法认为,“语言就是纯粹句法,完全与所有的意义、语境、感知、情感、记忆、注意、行为以及动态交流隔绝,并且是不依赖于以上这些因素的纯粹形式”(Lakoff et al. ,1999: 6), ECL 反对生成语法以逻辑推理和二元对立的形式化的理性思维来研究语言,认为必须依靠体验、直觉等非理性的认识方法,才能认识语言的本质。我们认为,“基于用法的模型”“情景编码假说”“表层概括假说”等都意在强调人的非理性认知如体验、直觉、情感等在语言理解中的重要作用。

体验哲学认为理性并非离身的,而是根植于我们大脑和本体的身体以及身体经验。理性无论如何都不是宇宙的超验特性或离身心智,理性的形成主要依靠人类身体的独特性、大脑神经结构的精微性以及我们在日常世界中的具体活动。体验哲学重视大脑和身体体验在理性建构中的作用,不可避免地引入了非理性因素,正如 Lakoff 和 Johnson (1999: 4) 所言:“理性并非不带情感的,反而是有情感参与的。”

3.6 后人道主义

后人道主义是以批判传统人道主义为己任的一股哲学思潮。以人类为中心的人道主义主张以人为本,强调人的力量,人的尊严,相信人的至高无上性。后人道主义首先围剿了“人”的概念,宣告了人的“死亡”。在后人道主义那里,人不再是物质世界的中心,也不是心理—精神世界的中心。其次,“人性论”是传统人道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种人性论的一个共同理论前提是肯定存在着某种共同的、亘古不变的人性和人的本质。后人道主义认为并不存在什么一般的永恒不变的人性和人的本质,认为传统人道主义的“人性”观念、人的本质观念应该抛弃。福柯对各式各样的人的本质观进行了批判。再次,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上,人道主义坚信人具有天赋的、无限的认识能力,思想可以绝对地认识一切事物的真理。后人道主义则通过怀疑主义颠覆了人道主义的这种自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颠覆了人道主义的“人类进步”的观念。

表 1 后现代哲学理论与 ECC 理论之间对应关系

后现代哲学特征或思潮		在 ECL 中的体现(文献出处)
总体特征	反传统	反语言学固有传统,如反结构主义语言学、生成语言学、形式语义学等(本文)
	差异性、特殊性(关注他者、边缘、弱小等)	表达差异性、关注习语等边缘构式(王寅,2015/2018)
	模糊性、不确定性、原型范畴论	语义模糊性、概念转喻(王寅,2013/2015);构式的相对性、基于使用的动态模型(席留生,2015)
主要思潮	非哲学	语言学理论一族、“象豹论”(本文)
	反基础主义	“表层概括假说”“基于使用的模型”(本文)
	非中心主义	反语音中心论、词汇中心论和句法中心论,以习语等边缘构式反溯核心构式(王寅,2013/2018);从研究理想化语言转向研究生活中言语(赵永峰,2015)
	多元主义方法论	认知语法中的“识解”(王寅,2015/2018);构式的概括性本质(刘玉梅,2013);田野调查、语料库方法等多种方法;定性、定量结合(赵永峰,2015);研究对象的多元化(席留生,2015)
	多视角主义	拒斥语言先验“客体”;“语言系统先验观”;拒斥语言“绝对主体”;“语言能力天赋观”(本文)
	非理性主义	语义研究为中心,重视人的非理性因素在语义形成中的作用;“基于用法的模型”、“情景编码假说”(本文)
	后人道主义;体验人本观	反对天赋观,提倡体验哲学(本文);体验哲学(王寅,2015);体验心智观、概括创新观(刘玉梅,2013);“意义等于概念化”(席留生,2015)

生成语言学认为人具有天赋的、先验的、无限的语言能力,把语言和现实世界二分对立,认为语言能力

和现实世界无关,这正体现了人道主义的思想。CL 和 ECL 反对人道主义所倡导的“人类中心论”,反对“人的至高无上性”,要求重新认识人(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强调人与世界的互动体验,语言能力不再是至高无上的天赋能力,而是人与现实世界进行互动体验认知加工后的产物。虽然人的认知加工对语言的形成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但 ECL 并未夸大人的认知能力,而把语言能力视为与人类其他认知能力一样的一般认知能力。

后现代哲学理论与 ECL 理论之间的对应关系见表 1。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后现代哲学的主要特征和思潮都在 ECL 中有所体现,ECL 的各种理论深深地打上了后现代哲学思想的烙印。

4 结语

当今“认知语言学”在理论背景方面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因忽视“体验”导致名实不符,第二,囿于体验哲学的哲学背景而视野狭窄。这两个问题都关涉“认知语言学”的哲学背景,针对这两个问题的修补形成了我们具有本土特色的语言学研究,即后现代哲学视野下的“体认语言学”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继续探讨了后现代哲学特征和各种哲学思潮对 ECL 产生的影响。ECL 的多数主张和理论都深深打上了后现代哲学思潮的烙印,后现代哲学是 ECL 和体验哲学产生的哲学背景。

但正如后现代哲学由于内部理论的复杂性而具有不同观点甚至相反观点一样,ECL 内部也存在与后现代哲学主张不一致的观点,如 Lakoff & Johnson(1999)坚持他们所创立的体验哲学是唯一正确的哲学,这与后现代“非哲学”罢黜“哲学王”的主张相悖。后现代哲学试图彻底摧毁理性,而 Lakoff & Johnson(1999)却试图通过体验哲学重建理性。再如,Goldberg(2006: 18)提出的“构式一贯到底”的“构式一元论”与后现代哲学所主张的“多元论”也背道而驰。尽管 CL 理论体现了后现代哲学的思想,但确有不少理论与后现代哲学不相一致,这或许和后现代哲学自身理论复杂性并现代性交织有关,或许是因为体验哲学对后现代哲学的认识不足。ECL 正是在看到这些不足时提出了更新的方向和要求,这确实可在未来研究加以深入探讨。

语言学,尤其是当代语言学,是在哲学的浸泡中产生的。作为语言研究者,我们如果不了解语言理论背后的哲学基础,就不能达到对语言学各种理论的透彻理解,其语言研究也将难以进行。国内语言学家王寅(2008/2009/2012c)、钱冠连(2008/2009)和李洪儒(2010/2011)等也一直倡导“语言学家应坚持走与‘哲学’紧密结合的道路”(王寅,2012c: 3)。

我们认为,ECL 既继承了 CL 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也弥补了其自身的理论和实践之不足。站在后现代哲学视野下研究 ECL,坚持唯物论和人本观,必将开辟语言研究的新面貌,实现 21 世纪中国学者立民族之林的梦想。

参考文献:

- Enrique B. 1999.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J].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 1:9-27.
- Evans, V. 2012. Review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J]. *Wiley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s: Cognitive Science* (3): 129-141.
- Goldberg, A. E. 2006. *Constructions at Work: 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koff, George. 2007. *Whose Freedom?: The Battle over America's Most Important Idea* [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 Lakoff, George & M. 2003.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koff, George & M. Johnson. 1999. *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M]. New York: Basic Books.
- Robins, R. H. 1967. *A Short History of Linguistics* [M]. London: Longman.
- Langacker, R.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ngacker, R. 1991.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Descriptive Application*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Taylor, J. 1989.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 [M]. Oxford: OUP.
- Wittgenstein, L. 1953.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M]. New York: Macmillan.

- 李洪儒. 2010. 索绪尔语言学的语言本体论预设[J]. 外语学刊 (6):17-24.
- 李洪儒. 2011. 中国语言哲学的发展之路[J]. 外语学刊 (6):1-4.
- 刘玉梅. 2013. 后现代哲学视野中的构式语法研究[J]. 外语学刊 (5):20-25.
- 钱冠连. 2008. 西语哲在外语界的传播与未来的发展[J]. 外语学刊 (2):1-16.
- 钱冠连. 2009. 西方语言哲学是语言研究的营养钵[J]. 外语学刊 (4):8-11.
- 王馥芳. 2014. 认知语言学反思性批评[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王馥芳. 2013a. 认知语言学掀起“体验革命”[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3-09-16.
- 王馥芳. 2013b. 认知语言学本质上反对语言学固有传统[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3-12-17.
- 王馥芳. 2015. 认知语义学改变传统语言研究图景[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5-06-01.
- 王寅. 2009. 主客主多重互动理解[J]. 哲学动态, (10): 84-89.
- 王寅. 2002. 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 体验哲学[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 82-89.
- 王寅. 2008. 语言研究新增长点思考之四: 后语言哲学探索[J]. 外语学刊 (4): 2-10.
- 王寅. 2009. 从后现代哲学的人本观看语言象似性[J]. 外语学刊 (6): 32-37.
- 王寅. 2012a. 哲学的第四转向: 后现代主义[J]. 外国语文 (2): 9-15.
- 王寅. 2012b. 后现代哲学视野下的语言学前沿——体验人本观与认知语言学[J]. 外国语 (6): 17-26.
- 王寅. 2012c. 新世纪语言学研究当与哲学紧密结合[J]. 外国语文 (5): 3-5.
- 王寅. 2013. 后现代哲学视野中的认知语言学——哲学第四转向后的语言学新论(上)[J]. 外语学刊 (5): 1-7.
- 王寅. 2014. 后现代哲学视野下的体认语言学[J]. 外国语文 (6): 61-67.
- 王寅. 2015. 后现代哲学视野中的认知语言学——哲学第四转向后的语言学新论(下)[J]. 外语学刊 (4): 58-64.
- 王寅. 2018. 后现代哲学视野下的构式语法研究——兼论体认语言学[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 132-138.
- 王寅, 王天翼. 2019. 基于体认语言学的英语语法教学[J]. 外语界 (1): 44-52.
- 王治河. 2006. 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席留生. 2015. 后现代哲学视野中的认知语法研究[J]. 外语学刊 (4): 71-75.
- 赵永峰. 2015. 后现代哲学思潮中的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J]. 外语学刊 (4): 65-70.
- 霍金·斯蒂芬, 列那德·蒙洛迪诺. 2011. 大设计[M]. 吴忠超, 译. 长沙: 湖南科技出版社.

Further Exploration of Postmodern Philosophical Origin in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PENG Zhibin

Abstract: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ECL) is a localized linguistic theory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repairing the deficiency of foreign Cognitive Linguistics (CL) in neglecting “materialism” and “humanism”, thus bringing linguistics research into the post-modern humanities tide, which is the forefront of the global humanities. It is found that most of the propositions and theories of ECL, which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CL, are influenced by post-modern philosophy.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post-modern philosophy such as “anti-tradition”, “difference”, “fuzziness” and philosophical trends of thought, like “non-philosophy”, “anti-fundamentalism”, “de-centralization”, “pluralistic methodology”, “perspectivism”, “post-humanism” and “irrationalism” are embodied in ECL. In the era of postmodern philosophy, the emergence of ECL as a linguistic research paradigm is the result of the times.

Key words: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post-modern philosophy; philosophical origin; embodied philosophy

责任编辑: 肖谊

现代风中的伦敦文学景观：
重构钱锺书牛津英文笔记中的英国现代文学场

陶家俊

(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北京 100089)

摘要:本文从皮埃尔·布迪厄的文化生产场理论视角,通过知识现象还原法,聚焦钱锺书牛津英文笔记呈现的现代风中的伦敦文学景观——英国现代主义文学景观;英国现代诙谐讽刺文学景观;现代英国文学研究和评论景观。论证钱锺书牛津英文笔记隐含的深层英国文学认知图示化结构。揭示钱锺书独特的文学观——扎根文学实践主体生命境遇、文学实践群体交往网络、文学生产和消费流程、文学风格和审美品味、文学评论和阐释的动态、多维文学观。

关键词:钱锺书;牛津英文笔记;文学景观;认知图示化结构

中图分类号:I561.0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19)05-0038-08

0 引言

钱锺书研究的第一大类是传记生平资料汇集和研究,如孔庆茂的《钱锺书传》、朱传誉编的《钱锺书传记资料》、杨绛的回忆录《我们仨》、吴学昭整理的《听杨绛谈往事》、宋以朗的《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第二类是回忆文集、纪念文集和研究集刊,如韩石山编的《和钱锺书同学的日子》《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杨联芬编的《钱锺书评说七十年》、谢泳编的《钱锺书和他的时代》、冯芝祥主编的三辑《钱锺书研究季刊》。第三类是钱锺书专项研究成果,如许龙的《钱锺书诗学思想研究》、季进的《钱锺书与西学》、台湾汪荣祖的《槐聚心史:钱锺书的自我及其微世界》。此外有《陈寅恪与钱锺书:一个隐含的诗学范式之争》(胡晓明)《陈寅恪与钱锺书》(刁生虎)这类研究论文。第四类是对钱锺书笔记、札记的整理出版。这主要指《钱锺书手稿集》《钱锺书文集·容安馆札记》《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五类是钱锺书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当时的各类中英文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以及他生前不同时期留下的大量诗作。这五类研究资料相互印证,在原始文献资料与评价论述研究资料这两个层面推动钱锺书研究发展。对钱锺书笔记、札记的研究(而不仅仅是资料整理)是钱锺书研究的空白,而对钱锺书《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1》的研究是钱锺书文学思想也是我国英国文学研究的空白。

1935年9月中旬钱锺书携杨绛抵达英伦,入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攻读英国文学,直到1937年8月离开英伦赴法国巴黎游学。他在1936年2月4日英文笔记的《饱蠹楼读书记》中写道:“与绛约间日赴大学图书馆读书各携笔札露钞雪纂聊补三篋之无铁画银钩虚说千毫之秃是为引。”(钱锺书,2014:5)接着,他在1936年3月30日的《饱蠹楼读书记》中写道:“心同椰子纳群书金匱青箱总不如捉要钩玄留指爪忘筌他日并无鱼。”(钱锺书,2014:201)1936年夏钱锺书与杨绛赴巴黎小住,离开时他在《英文笔记》中引用陆游诗句“病里正须周易,醉中却要离骚”抒怀。

钱锺书记英文笔记,初衷是为了记录在牛津大学博德林图书馆博览群书的龙津风声,但是这种隔日赴图书馆阅览钩抄的习惯一直延续到离开英伦之后的岁月。根据吴学昭及德国汉学家莫芝宜佳(Monika Motsch)、莫律祺(Richard Motsch)等协助杨绛整理完工、由商务印书馆2014年首次印刷出版的《钱锺书手稿

收稿日期:2019-05-16

作者简介:陶家俊,男,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语文学、后殖民研究、跨文化研究及西方批评理论研究。

集·外文笔记1》的编排顺序,钱锺书在牛津期间的英文笔记主要指该三卷本第一卷和第二卷前半部分,即整个英文笔记第一号(No. 1)至第五号(No. 5)。它们以原初质朴、笔意汪洋、隐而不宣的方式表现了一种极其独特的知识和思想存在的方式、一种知识和思想跨文化流动迁徙的样态——栖居于公开出版、收藏的英文书籍文本与钱锺书公开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书籍文本之间的私人文本,类似于他所关注发掘的中国古代家常体文本。

这五册英文笔记总计205条,表面上处于静止、孤立、散乱状态,实际上却有着自身内在的秩序、核心和生命。它们不仅以别样存在的方式言说着笔记主人的思想和精神生命的烛影梅香,而且丝丝缕缕地透露出笔记主人投入了浓厚兴趣、精心选择的跨文化的文学对象的生命律动。这个对象以英国现代文学为亮点,现代文学研究和评论为旨要,西方哲学、心理学和史学等多学科知识为延伸旁枝。因此本文从皮埃尔·布迪厄的文化生产场理论视角,通过知识现象还原法,聚焦钱锺书牛津英文笔记呈现的现代风中的伦敦文学景观的四个维度:(1)英国现代主义文学景观;(2)英国现代诙谐讽刺文学景观;(3)现代英国文学研究和评论景观;(4)英国文学认知的图示化结构。

1 英国现代主义文学景观

《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1》总计摘录了25位现代主义人物的29部作品。这些作品包括:T. S. 艾略特(T. S. Eliot)的《圣林》、维维安·德·索拉·平托(Vivian de Sola Pinto)的《罗切斯特》、理查德·沃尔丁顿(Richard Aldington)的《文学研究与评论》、埃德蒙·戈斯(Emund Gosse)的《文学肖像》、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的《斯文朋与波德莱尔》《保罗·魏尔伦》、亚瑟·沃(Arthur Waugh)的《传统与变化》、亚瑟·兰塞姆(Arthur Ransome)的《伦敦德波希米亚》、弗兰克·哈里斯(Frank Harris)的《当代肖像》、C. K. 斯科特-蒙克里夫(C. K. Scott-Moncrieff)的《马塞尔·普鲁斯特:英文颂词》、德斯蒙德·麦卡锡(Desmond MacCarthy)的《肖像》《经验》、迈克尔·萨德利尔(Michael Sadlier)的《布尔沃全景》、门罗·萨基(H. H. Munro Saki)的《克洛维斯编年史》、乔治·穆尔(George Moore)的《伊斯特·沃特斯》、W. S. 毛姆(W. S. Maugham)的《探索者》、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铬黄》《目的与手段》、J. C. 斯夸尔(J. C. Squire)的《书评》、赫伯特·乔治·詹金斯(Herbert Jenkins)的《夜总会》、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Alfred Douglas)的《奥斯卡·王尔德与我自己》《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自传》、埃德温·缪尔(Edwin Muir)的《纬度》、J. S. 西蒙兹(J. A. Symonds)的《古希腊诗人研究》、欧内斯特·A. 博伊德(Ernest A. Boyd)的《鉴赏与贬评》、艾弗·布朗(Ivor Brown)的《棕色研究》、E. V. 卢卡斯(E. V. Lucas)的《穿过布雷默顿》、帕特里克·布雷布鲁克(Patrick Braybrooke)的《埃德蒙·戈斯考》和F. W. 梅特兰(F. W. Maitland)的《莱斯利·斯蒂芬生平与书信》。

理查德·沃尔丁顿是诗人、小说家、评论家、编辑,与庞德(Ezra Pound)的意象派、劳伦斯(D. H. Lawrence)夫妇和T. S. 艾略特多重交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与现代派女诗人希尔达·杜丽托(Hilda Doolittle)结婚,与庞德、T. E. 休姆(T. E. Hulme)并肩开辟意象派潮流,评论温汉姆·刘易斯(Wynham Lewis)的诗作,并与福特·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频繁联系。1915年后他一度与劳伦斯夫妇成为近邻密友。沃尔丁顿对刚出道的艾略特爱护扶持,让艾略特接替他在《利己主义者》的编辑职位,并将他介绍给《泰晤士文学副刊》的编辑布鲁斯·里齐蒙德(Bruce Richmond)。1910年后庞德、劳伦斯和艾略特声名鹊起,他深度参与,功不可没。艾弗·布朗则以反现代主义的态度来评价庞德和艾略特。维维安·德·索拉·平托是劳伦斯的首席研究专家,也是一战桂冠诗人西格弗里德·沙逊(Siegfried Sassoon)的密友。

身为评论家和编辑的恩内斯特·A. 博伊德不仅编辑爱尔兰小说家乔伊斯(James Joyce)和诗人叶芝(W. B. Yeats)的作品,而且对其进行评论。埃德蒙·戈斯少年时是小说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密友。出道时任大英博物馆助理馆员。经朋友介绍进入“先拉斐尔兄弟会”这个文雅圈子。他不遗余力地将挪威剧作家易卜生(Henrik Ibsen)的戏剧翻译介绍到英国。在1910、1915年全力解决了困居伦敦的叶芝和乔伊斯的生计之苦。因此,透过博伊德和哥斯,我们窥见了伦敦现代主义文学

风潮中爱尔兰文学复兴的风景。哥斯的权威评论家无疑是帕特里克·布雷布鲁克(Patrick Braybrooke)。钱锺书阅读的正是布雷布鲁克的《埃德蒙·戈斯考》。

钱锺书切入的伦敦文学景观与剑桥“使徒社”及伦敦的“布鲁姆斯伯里小组”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连。爱尔兰人弗兰克·哈里斯既是小组的圈内人,又在圈外广交朋友,熟知圈子内外的文坛秘闻趣事。由他操笔记录的《当代肖像》揭示了众多文人才子和名流不为外人所知也不为正史所载的八卦。例如他笔下的萧伯纳面孔瘦削多骨,因为他凡事爱追根究底。达尔文走红时,身边围着一群嚼舌女士,似蜜蜂叮在一碟子糖块上。钱锺书阅读涉猎的德斯蒙德·麦卡锡横跨“使徒社”和“布鲁姆斯伯里小组”,与斯特拉奇、罗素等都是老朋友。与喜欢八卦的哈里斯不同,G. E. 穆尔则是这个群体的精神领袖。难能可贵的是,钱锺书还从图书馆挖出了为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父亲莱斯利·史蒂芬(Leslie Stephen)作传编撰的评论家F. W. 梅特兰的传世之作《莱斯利·史蒂芬生平与书信集》。钱锺书自然不会漏掉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这位出了名的乖张风流的时髦人物以及围在他身边的倾慕者。他两度摘抄王尔德的同性恋人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的《自传》。还不忘搜罗深受王尔德艺术理论和风格影响的著名短篇小说家门罗·萨基的作品。在英文笔记中钱锺书阅读摘抄的其他现代主义名家包括毛姆、奥尔德斯·赫胥黎等。

伦敦文学景观中对法国现代主义情有独钟的人物无疑是哈罗德·尼科尔森。他是职业外交官,同时也是作家和评论家。他的妻子是大名鼎鼎的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Vita Sackville-West)——20世纪20年代伦敦文学场的知名女作家、前卫女性、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同性恋密友。受维塔影响,尼科尔森涉足文学评论和创作,在法国现代主义诗人的传记研究和创作领域里独树一帜,为法国现代主义诗人如魏尔伦(Paul Verlaine)、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圣-伯夫(Sainte-Beuve)乃至英国作家拜伦和司文朋写传立名。苏格兰作家C. K. 斯科特-蒙克里夫以翻译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小说而闻名。庞德专门翻译了法国象征派诗人雷米·德·古尔蒙(Remy de Gourmont)的诗。

对伦敦现代前卫先锋风尚最权威的评论人物无疑是集评论家、记者、作家于一身的亚瑟·兰塞姆。他1907年问世的那本《伦敦的波西米亚》是了解伦敦的波西米亚文学艺术群体史实、代表人物、逸闻趣事的捷径。但是构成伦敦现代主义文学景观的另一重要部分是那些出入各种先锋文学圈子、掌握出版社和文学期刊话语权的出版商和编辑。这也是钱锺书牛津英文笔记的另一个亮点。弗兰克·哈里斯开始时靠给《伦敦新闻晚报》(*London Evening News*)、《双周评论》(*Fortnightly Review*)、《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做编辑而扬名伦敦文坛。20世纪知名小说家伊夫林·沃(Evelyn Waugh)的父亲亚瑟·沃是第一个为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立传的作家,曾为黄色期刊《黄书》(*Yellow Book*)首期撰稿,长期任《纽约评论家》(*New York Critic*)记者,主笔《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的文学评论栏目。20世纪的前30年他一直是查普曼与霍尔出版社(Chapman and Hall)的总经理和董事长。迈克尔·萨德利尔是有名的现代艺术和文学手稿收藏家。他收藏的现代艺术品包括德国表现主义艺术家,还将俄罗斯现代主义画家和美术理论家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论表现主义抽象艺术的《论艺术中的精神》翻译成英文。1914年该译文的节选刊登在漩涡派文学杂志《爆炸》上。除了担任过康斯特布尔与鲁滨孙出版社(Constable & Robinson)经理外,他还是安妮女王出版社(Queen Anne Press)发行的《书籍指南》(后来更名为《书籍收藏家》)的总编和撰稿人。

J. C. 斯夸尔在20世纪20年代伦敦文学场中是一方人物。他最早开始为《新时代》(*The New Age*)做评论,1912年左右被任命为《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的文学编辑,兼为该刊做评论(包括评说劳伦斯的新小说《虹》)。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已升任该刊的执行编辑,在伦敦文学出版业中掌控了实力雄厚的人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1934年他一直担任《伦敦水星》(*London Mercury*)的编辑。他周围形成的文人圈子被“布鲁姆斯伯里小组”戏称为“斯夸尔党”(Squirearchy)。弗吉尼亚·伍尔芙讽刺他粗俗,令人生厌。T. S. 艾略特认为斯夸尔一派必是现代主义的灾难,指责他利用《伦敦水星》,用新闻式的流行评论来污染伦敦文学场。其实文人间的口水仗暴露的无非是先锋派的小杂志与顺应大众市场消费的期刊之间的不同取向和策略,呈现出现代主义作家群体的生存之道。例如赫伯特·詹金斯1912年创立了自己的赫伯特·詹金

斯出版公司。这家小众出版社积极适应读者群不断变化的品位,别具慧眼地发现文学新秀。他自己的创作中最受欢迎的是以侦探马尔科姆·塞奇(Malcolm Sage)为核心人物的系列短篇侦探故事。爱德华·维拉尔·卢卡斯 16 岁时开始给英国布莱顿的一位书商当学徒,后来受雇于《苏塞克斯每日新闻报》(*Sussex Daily News*)。然后他到伦敦碰运气,加入《全球晚报》。1904 年他开始加入幽默杂志《笨拙》(*Punch*)。同时在近 15 年的时间里他也是梅休因出版公司(Methuen and Co.)雇佣的专业审稿人,最终于 1924 年主掌该出版公司。

这就是钱锺书英文笔记中隐在的英国现代主义鲜活、动态、立体多维的图景。这种对英国 20 世纪上半叶文学生态的零距离感受和记载甚至扩大到现代主义群落之外,打上了钱锺书特有的文学风格烙印。

2 英国现代诙谐幽默文学景观

《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 1》中隐匿的第二个文学景观是 19 世纪末以来饮誉文坛的英国现代诙谐幽默文学。笔记中这个群体的作家作品包括:托马斯·安斯蒂(Thomas Anstey)的《旅行伙伴》《坠落的偶像》《布兰克利家的男人》、杰罗姆·克拉普卡·杰罗姆(J. K. Jerome)的《三懒闲游记》、J. B. 莫顿(J. B. Morton)的《焰火》、W. W. 雅各布斯(W. W. Jacobs)的《盐港》、W. L. 乔治(W. L. George)的《陌生人的婚礼》、约翰·巴肯(John Buchan)的《固执先生》《羊岛》《向历险者致敬》《三个人质》《早上的法庭》、萨基(H. H. Munro Saki)的《克洛维斯编年史》、巴里·潘(Barry Pain)的《幽默故事集》、A. P. 赫伯特(A. P. Herbert)的《神圣的僵局》、H. C. 贝利(H. C. Bailey)的《算命先生》、P. G. 沃德豪斯(P. G. Wodehouse)的《幽默世纪》《我的男仆吉夫斯》;菲利普·格拉达的(Philip Guedalla)的《革命先辈》、E. V. 卢卡斯(E. V. Lucas)的《穿过布雷默顿》。

托马斯·安斯蒂原名托马斯·安斯蒂·格里斯(Thomas Anstey Guthrie)。这位剑桥毕业的才子以幽默故事《父子替身》(1882)一举成名,此后发表的《黑色贵妇犬》《彩色维纳斯》《堕落的偶像》《贾伯吉·B. A. 先生》《来自孟加拉的勇敢者》持续奠定了他的文名。他是《笨拙》杂志的重要成员,在《笨拙》上发表了自己的代表作《谬论》和《窃贼比尔与 C》。

杰罗姆·克拉普卡·杰罗姆初出道时靠演戏和写剧本谋生。1889 年他根据自己新婚蜜月体验而写成的《三人同舟》融喜剧情景与泰晤士河为一体,出版后立刻产生轰动效应。此后 20 年间该书销售超过百万册,且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广播剧、舞台剧甚至音乐剧。此君曾接替吉普林(Rudyard Kipling),负责编辑《懒汉》(*The Idler*)杂志——一份满足绅士阶层悠闲嗜好、以插图版讽刺故事为特色的月刊。1893 年他自办《今日》(*To-Day*)杂志。后来根据到德国旅行的经历写过《三人同舟》的姊妹篇《三懒闲游记》。

J. B. 莫顿的幽默文名靠他从 1924 年至 1975 年长达 50 年的时间内以笔名“比奇科默”(Beachcomber)为《每日快讯报》(*Daily Express*)的《闲话》专栏撰写稿件。小说家伊夫琳·沃认为他具有英格兰人天生的最充沛的喜剧细胞。他步入文坛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基于对战争亲身体验的小说《帕特尼的理发师》。同时他开始在《星期日快报》(*Sunday Express*)上开出每周专栏。值得一提的是他编写的《闲话》专栏是如此引人入胜,以至于 BBC 将其录制成 18 期节目,从 1989 年至 1994 年连续播出。更值得关注的是,在伦敦文学场中,莫顿属于 J. C. 斯夸尔的圈子,又混迹于希莱尔·贝洛克(Hilaire Belloc)的圈子“切斯特顿-贝洛克圈子”(the Chesterton-Belloc Circle)。

W. W. 雅各布斯擅长写作幽默短篇,尤以收入短篇小说集《游艇女士》中的恐怖故事《猴子的爪》(1902)最受欢迎。雅各布斯的文笔颇有狄更斯遗风。W. L. 乔治在法国巴黎出生长大,成年后才回到英国,成名作包括小说《玫瑰床》《晨之子》。约翰·巴肯贵为加拿大总督,位列贵族男爵,却以《三十九级台阶》(1915)和其他冒险故事享誉文坛。萨基是诙谐作家赫克托·休·门罗(Hector Hugh Munro)的笔名。他的诙谐、淘气甚至惊恐故事肆意讽刺英国爱德华时代的社会文化。他一方面受到奥斯卡·王尔德、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和 R. 吉普林影响,另一方面又影响了 P. G. 沃德豪斯等一代人,是与美国的欧·亨利(O. Henry)并驾齐驱的英国短篇幽默故事大师。萨基给《每日快讯报》(*Daily Express*)《晨报》(*Morning Post*)等作过记者。巴里·潘的文笔风格是诙谐模仿和轻淡幽默。他最初给《康希尔杂志》(*Cornhill Magazine*)做

编辑,发表短篇《百扇门》,后来为《笨拙》和《闲话者》(*Speaker*)撰稿,受雇于《每日纪事报》(*Daily Chronicle*)和《黑与白》(*Black and White*)。同时他在1896-1928年是《温莎杂志》的固定撰稿人。罗伯特·史蒂文生将他比作莫泊桑。A. P. 赫伯特1910年8月在《笨拙》上发表了题为《维纳斯的石头》的组诗,此后定期为《笨拙》撰稿;同时也开始在《观察家》(*The Observer*)《名利场》(*Vanity Fair*)上发表文章。1924年他应邀加入《笨拙》编辑阵营。他在《笨拙》上刊出的文章针对英国立法和司法制度,以法律报道或评论的形式发表讽刺文章,代表作包括《判例法中的离奇案件》《国税局对薄黑鳕鱼》。H. C. 贝利专写侦探短篇故事,多发表在《冒险》(*Adventure*)《埃勒里·奎因秘闻杂志》(*Ellery Queen's Mystery Magazine*)等杂志上。其笔下第一个系列围绕类似福尔摩斯的医学侦探福星雷吉。这些故事阴暗,情节多涉及谋杀、警界腐败、金融欺诈、虐待儿童、司法不公等内容。第二个系列围绕的核心人物是伪善律师约书亚·克朗克,揭露的是地方政治中的钩心斗角、腐败欺诈。代表作是1935年出版的《阴沉天之秘》。

P. G. 沃德豪斯是20世纪英国最受欢迎的幽默小说大师之一。他的早期小说以学校题材为主,后来转向喜剧题材。他笔下备受读者欢迎喜爱的喜剧人物包括笨拙型的伯迪·伍斯特和他精明世故的男仆吉夫斯、迟钝型的埃姆沃斯爵士及布兰丁斯·卡斯尔、饶舌多嘴的“元老”和马利纳先生。伍德豪斯的喜剧幽默经典以英格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为背景,雕琢的是一幅遗世独立的童话般生活画卷,字里行间流淌着轻松自如、豁达开朗的生活情趣。伍德豪斯既拥有查尔斯·狄更斯和查尔斯·卓别林那种展现个体对社会的喜剧式反叛的才能,又能充分地汲取英国文学先辈大师的菁华。此外他为美国音乐剧的发展和好莱坞演艺也做出独特贡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之后,他长期与美国同行合作,创作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百老汇音乐喜剧。20世纪30年代他又参与好莱坞电影剧本的创作。他一生多产,出版了90多本书、40个剧本、两百多篇短篇小说。

3 现代英国文学研究和评论景观

进入钱锺书视野的近30位现代英国文学研究和评论家包括:T. S. 艾略特、维维安·德·索拉·平托、爱德华·尚克斯(Edward Shanks)、理查德·沃尔丁顿(Richard Aldington)、奥利弗·埃尔顿(Oliver Elton)、查尔斯·哈罗德·赫福德(Charles Harold Herford)、艾弗·埃文斯(Ifor Evans)、约翰·丘顿·柯林斯(John Churton Collins)、亚瑟·托马斯·奎勒-库奇(Arthur Thomas Quiller-Couch)、爱德华·道登(Edward Dowden)、爱德蒙·戈斯、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范·威克·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奥洛·威廉姆斯(Orlo Williams)、哈罗德·尼科尔森、恩内斯特·博伊德、伯顿·拉斯科(Burton Rascoe)、德斯蒙德·麦卡锡(Desmond McCarthy)、弗兰克·亚瑟·斯温纳顿(Frank Arthur Swinnerton)、J. C. 斯夸尔、乔治·亨利·刘易斯(George Henry Lewes)、J. W. H. 阿特金斯(J. W. H. Atkins)、乔治·圣茨伯里(George Saintsbury)、詹姆士·拉弗(James Laver)、爱德华·道登(Edward Dowden)、科文垂·帕特莫(Conventry Patmore)、约翰·阿丁顿·西蒙兹(John Addington Symonds)、亚瑟·宾汉·沃克利(Arthur Bingham Walkley)、艾弗·布朗(Ivor Brown)、蒙纳·威尔逊(Mona Wilson)。这些文学评论家和研究者可分为:现代主义主流群体中的文学评论家、现代主义文学场中依附于各类刊物且交往多元庞杂的文学评论家、大学中的文学研究者、维多利亚时代的知名文评家、影响力弱的评论家。而其中不少评论家同时又是诗人、作家和编辑。

主流现代主义评论家分属于艾略特-庞德群体、布卢姆斯伯里小组、斯夸尔圈子、爱尔兰文学复兴圈子。艾略特不仅是整个现代主义先锋群落的领袖,也是举足轻重的大评论家,其文评思想被美国新批评派奉为圣经。其名篇如《传统与个人才能》《玄学派诗人》《哈姆莱特和他的问题》等都收入钱锺书阅读的《圣林》。沃尔丁顿在文学编辑和评论方面的影响和作用可从他参与的文学刊物编辑状况中得到证实。1914—1916年他是《利己主义者》的文学编辑和专栏作家,后来成为《泰晤士文学副刊》的法国文学编辑。1919—1921年他与艾略特、刘易斯、奥尔德斯·赫胥黎等同为伦敦文学季刊《圈子》(*Coterie*)的编委会成员。“布卢姆斯伯里小组”成员德斯蒙德·麦卡锡1917年加入《新政治家》刊物,做戏剧评论,1920年升任该刊文学编辑。在该刊上他长期开辟专栏。1928年他的兴趣从《新政治家》转到其他刊物,担任过《生活与文雅》(*Life and*

Letters)的第一编辑,做过《新季刊》(*New Quarterly*)《目击者》(*Eye Witness*)《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的文学编辑。其文学评论和随笔包括《宫廷剧院》《群像》以及钱锺书没有来得及阅读的《戏剧》《剧院》。J. C. 斯夸尔最先与《新时代》(*The New Age*)结缘,1909 年在该刊发表讽刺文,后来持续在该刊发表评论文章,其中一篇就是评论劳伦斯的新作《虹》。他 1912 年成为该刊文学编辑,1917—1918 年任执行编辑。借此他掌控了一个资源庞大的文学出版阵地。1919—1934 年间他还任过月刊《伦敦水星》的编辑,与约翰·米德尔顿·默里(John Middleton Murry)编辑的《雅典娜神庙》(*The Athenaeum*)竞争。其可圈点的文学评论和选集包括《诗歌与波德莱尔之花》《现代诗人诗作选》《戏剧家莎士比亚》。恩内斯特·博伊德无疑是爱尔兰复兴运动的吹鼓手评论家。他 1916 年的评论专著《爱尔兰文学复兴运动》(*Ireland's Literary Renaissance*)最先将爱尔兰文学复兴定义为民族运动,将乔伊斯、叶芝奉为精神拓荒者。他其他有影响的评论包括《鉴赏与贬评》《当代爱尔兰戏剧》《真实的和想象的肖像》等。

爱德蒙·戈斯无疑是现代主义批评闯将的前辈。他率先将挪威戏剧家易卜生译介到英伦。1884—1890 年他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教过英国文学。他在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威廉·康格里夫(William Congreve)、约翰·多恩(John Donne)、杰里米·泰勒(Jeremy Taylor)、柯文垂·帕特莫尔(Coventry Patmore)等英国 17、18 世纪作家研究上造诣很高,是《大不列颠百科全书》1911 年版的文学编辑。他的批评力作有《十七世纪研究》《十八世纪文学史》和《现代英国文学史》。弗兰克·斯温纳顿提携过奥尔德斯·赫胥黎、利顿·斯特拉奇等文坛弄潮人,又与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阿诺德·本尼特(Arnold Bennett)等老派作家交好。他最先给查图与温德斯出版社(Chatto & Windus)做编辑,1929—1932 年间给《真理》(*Truth*)《伦敦晚报》(*London Evening News*)做文学评论,1937—1943 年给《观察家》(*The Observer*)做文学评论。他最负盛名的评论之作是《乔治时代的文学场景》。其他有价值的著作是《R. L. 史蒂文森:批评研究》和研究文学书籍出版业的《作者与书业》《书籍评论与批评》《书商的伦敦》《手稿历险记》。

此外,是一批与现代主义阵营关联度不高,栖息于各类出版社、文学期刊和文学评论栏目,在现代文学评论中谋职抒趣的文学评论家。爱德华·尚克斯 1912—1913 年做过《格兰塔》(*Granta*)的编辑;1919—1922 年为《伦敦水星》(*London Mercury*)做文学评论;1928—1935 年是《标准晚报》(*Evening Standard*)的首席作家。传世之作有《萧伯纳》《爱伦·坡》《R. 吉普林:文学与政治观研究》。詹姆士·拉弗在牛津新学院时就薄有诗名。毕业后在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谋生,业余为各类期刊撰写书评、剧评、戏剧翻译等,还一度在大学开过英国文学课程和艺术课程,有《剧院设计》《奥斯卡·王尔德》传世。同样在戏剧表演和评论领域有建树的是亚瑟·宾汉·沃克利,他出道时与萧伯纳在《星报》(*The Star*)共事;在《泰晤士报》做过长达 26 年的戏剧评论。除了戏剧评论,他晚年还在《泰晤士报》上发表对简·奥斯丁、约翰逊博士、狄更斯、兰姆的评论文章。其评论思想尽可从《戏剧评论》中掬取。艾弗·布朗同样热衷戏剧评论。他最先为《新时代》撰稿,1919 年在《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谋得差事,并在 1923 年成为《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的戏剧评论员,1926 年成为利物浦大学戏剧艺术讲师,1929 年受聘为《观察家》的戏剧评论员。20 世纪 30 年代他成为饮誉英国传媒界的戏剧评论家,并顺理成章在 1939 年被任命为皇家文学学会戏剧教授。布朗老成持重,不愿追随现代主义时髦叛逆之风,对艾略特、庞德等多讽刺挖苦。

第三类是大学的文学研究学者。这些学者包括:维维安·德·索拉·平托、艾弗·埃文斯、奥利弗·埃尔顿、查尔斯·哈罗德·赫福德、约翰·丘顿·柯林斯、亚瑟·托马斯·奎勒-库奇、乔治·圣茨伯里、爱德华·道登。平托长时间(1938—1961)任诺丁汉大学英语系教授,其主要学术影响是 D. H. 劳伦斯研究。埃尔顿在曼彻斯特大学做讲师时发表《奥古斯丁时代》(1899),引起学界关注。此后的 1901—1925 年间在利物浦大学担任英国文学教授,负责完成四卷本《英国文学通览》,勤于研究密尔顿、丁尼生、亨利·詹姆士等作家。赫福德先后在威尔士大学学院、曼彻斯特的维多利亚大学任教授,最大的学术贡献是为本·琼森(Ben Jonson)立传,编辑了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11 卷《本·琼森作品集》。亚瑟·奎勒-库奇受业于牛津大学三一学院,又在统一学院任教职。早期批评系列文章是《批评历险》,编辑了 16、17 世纪英国抒情诗人诗选《金萃集》,后来还编辑出版了扛鼎之作《牛津英诗集:1250—1900 年》。此外,他编辑整理了《源自古

法语的睡美人及其他童话故事》。成名后的奎勒-库奇 1912 年被任命为剑桥大学英国文学“国王爱德华七世教授”,成为剑桥英文研究的创建者之一。乔治·圣茨伯里做过曼彻斯特文法学校校长,为《学苑》(*The Academy*)撰写过评论文章,在长达十年里为《星期六评论》效力,最终于 1895 年成为爱丁堡大学修辞与英国文学教授。他在英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成就有:18 卷的《约翰·德莱顿作品集》,《伊丽莎白朝文学史》《19 世纪文学史》《英国文学简史》及三卷《批评史》。爱德华·道登 1867 年开始在爱尔兰都柏林大学任英国文学教授,其专长之一是莎士比亚研究,著述包括《莎士比亚、思想与艺术》《威廉·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他最受瞩目的成果是诗人雪莱的传记《雪莱生平》。

笔记也包括美国大学中的文学研究者,如欧文·白璧德、范·威克·布鲁克斯、伯顿·拉斯科等。钱锺书对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之娴熟了解自不在话下。布鲁克斯曾获美国第二届非小说类国家图书奖、1937 年度普利策历史奖,甚至在 1944 年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维多利亚时代的文胆评匠包括乔治·亨利·刘易斯、科文垂·帕特莫、约翰·阿丁顿·西蒙兹。至于笔记中摘录的奥洛·威廉姆斯、J. W. H. 阿特金斯和蒙纳·威尔逊等基本是知名度不高的文学研究者。其中,奥洛·威廉姆斯著有《波西米亚:巴黎的浪漫》,阿特金斯著有两卷本的《古希腊罗马文学批评简史》,蒙纳·威尔逊在简·奥斯丁研究领域有专著留世。

4 英国文学认知的图示化结构

通过对钱锺书英文笔记上述三维景观的重构,我们发现这些数量庞杂、散乱的笔记在深层结构上有着明确、系统的英国文学认知图示化结构。这反过来又表现了钱锺书的文学观。布迪厄在《文化生产场》中指出:“……在特定时刻的文化生产场中铭刻的客观可能(例如经济的或象征的利益)只有通过‘职业’‘抱负’和‘前程’才变得有作用,处于活跃状态。通过构成习性的感知和评价图示化结构来感知、评价它们。”(Bourdieu, 1993: 64)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关注表层文学文本或现代艺术家、作家和知识分子孤立的成长过程,而是应分析他们怎样获取、占据、守护文化生产场中的象征文化位置,认识与这些位置对应的、产生特定习性的特定社会状况。文化生产场的空间分隔、不同参与者的位置、文艺作品的类型和风格、参与者的社会归属及习性,构成了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图示化结构。

以三维景观为表征,这个深层的英国文学认知图示化结构包括以下五个主要纬度:表层的各类文学文本;由单个作家结成的文学团体或群体及其内外人际关联网;作家与各类文学出版物、出版商、编辑之间的关联网;以现代主义和诙谐讽刺为典型特征的文学风格及其与文学团体和群体的审美取向、品味和价值取向的内在文化生产关系;以文学出版物为喉舌的文学评论家和相对独立且与文学场渐行渐远的大学中的文学研究者。借用阿君·阿帕杜莱(Appadurai, 2003: 25)在《全球文化经济中的分离和差异》中使用的核心概念“景观”(scape),这五个纬度构成了英国文学的多维多元景观。但是与阿君·阿帕杜莱的断裂观不同,钱锺书勾连的文学景观之间交织着连接与分离、同质与异质两类张力。例如,文学文本与作家、作家团体、出版商、编辑、风格、审美品位、评论家之间是连接、同质关系。而不同类型、风格的文学文本、不同团体、不同出版商之间,依附于文学出版物的文学评论家与学院派文学研究者之间却是分离、异质关系。两类张力左右下的文学景观都以伦敦为英国现代文学场的中心(同时也是世界文学空间的中心之一)。几乎所有作家都聚集到这里,所有有影响的出版商和文学刊物都集中在这里。伦敦成了作家成名、作品成为经典的必由之地,成了品味和风格的裁判所,成了作家文人问鼎文学圣坛的乐园,成了作家文人积累文化象征资本的中心。

依据上述英国文学认知图示化结构,我们发现钱锺书以独特的笔记铭写方式在形而下意义上践行了一种独特的文学观——扎根文学实践主体生命境遇、文学实践群体交往网络、文学生产和消费流程、文学风格和审美品位、文学评论和阐释的动态、多维文学观。文学成了一个全息生命过程——在特定的文化情景中,遵循特定的文化和社会生产规则,依赖特定的文学体制化实践,信奉特定的美学主张,实现生命向精神化世界超越的进程。这个精神化的世界,这个纯粹让生命融入历史并达到卓绝的境界,就是无阻无碍的诗学及文明的周流存续。这种隐含的文学观在约十年后问世的《谈艺录》中终于从隐匿的状态变为显在的言说。

借助对中西诗学的打通烛照,他揭示出诗艺最内核的“心”和“理”的趋同相通——异类互补,异中证同。“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锺书,1984:1)

其实作为一种未公开在文学场中流通的、隐匿状态的、原始的也是最朴质地刻写知识和思想印迹的文本,钱锺书的英文笔记与他在20世纪40年代的《围城》和《谈艺录》构成了三类文本。这三类文本无论是在时间、文类、文本在世界中的存在和栖居样态还是在文学场中的流通状态上,都使我们在异类互补、异中证同的原理基础上,确证钱锺书英文笔记中隐匿的英国文学图示化结构及文学观。

参考文献:

- Appadurai, Arjun. 2003.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G]//Jana Evans Braziel and Anita Mannur. *Theorizing Diaspora*.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 Bourdieu, Pierre. 1993.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M]. New York: Columbia UP.
- Bourdieu, Pierre. 1995. *The Rules of Art*[M]. Stanford: Stanford UP.
- 刁生虎. 2007. 陈寅恪与钱锺书学术思想及治学方法之比较[J]. 史学月刊(2):90-104.
- 丁伟志. 2010. 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冯芝祥. 1999. 钱锺书研究季刊·第一辑[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 冯芝祥. 2000. 钱锺书研究季刊·第二辑[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 冯芝祥. 2002. 钱锺书研究季刊·第三辑[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 韩石山. 2007. 和钱锺书同学的日子[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 胡晓明. 1998. 陈寅恪与钱锺书:一个隐含的诗学范式之争[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67-73.
- 季进. 2011. 钱锺书与西学[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孔庆茂. 1992. 钱锺书传[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 钱锺书. 1984. 谈艺录[M]. 北京:中华书局.
- 钱锺书. 2003. 钱锺书文集·容安馆札记[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钱锺书. 2014. 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1[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钱锺书. 2015. 钱锺书手稿集[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宋以朗. 2015. 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M]. 广州:花城出版社.
- 汪荣祖. 2014. 槐聚心史:钱锺书的自我及其微世界[M]. 台北:台大出版中心.
- 吴学昭. 2008. 听杨绛谈往事[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谢泳. 2009. 钱锺书和他的时代[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 许龙. 2006. 钱锺书诗学思想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杨绛. 2003. 我们仨[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杨联芬. 2010. 钱锺书评说七十年[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 朱传誉. 1986. 钱锺书传记资料[G]. 台北:台湾天一出版社.

London's Literary Scapes in Modern Wind: Reconstructing British Modern Literary Field Latent in Qian Zhongshu's Oxford English Notes

TAO Jiajun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ierre Bourdieu's theory of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via the method of restoration of epistemological phenomenon,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London's literary scapes in modern wind symptomatic in Qian Zhongshu's Oxford English Notes—the scape of British Modernist literature, the scape of British modern witty and humorous literature, and the scape of modern British literary study and review. Furthermore, it verifies the latent deep cognitive schemata of British literature and reveals Qian Zhongshu's unique conceptualization of literature—a dynamic and multi-dimensional conceptualization rooted in the life circumstance of literary subject of praxis, the communicative network of literary community of praxis, the process of literary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literary style and aesthetic taste, and literary review and interpretation.

Key words: Qian Zhongshu; Oxford English Notes; literary scape; cognitive schemata